

现代国家成长研究丛书

Geming Zhengdang yu Xiangcun Shehui

革命政党与乡村社会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态研究



李里峰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现代国家成长研究丛书

Geming Zhengdang yu Xiangcun Shehui

革命政党与乡村社会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态研究



李里峰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革命政党与乡村社会: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态研究/李里峰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 2

(现代国家成长研究丛书)

ISBN 978-7-214-06826-2

I. ①革… II. ①李… III. ①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1937~1945 IV. ①D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23250 号

书 名 革命政党与乡村社会——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态研究

作 者 李里峰

责任编辑 戴亦梁 丁 萍

装帧设计 许文菲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 mm×1 304 mm 1/32

印 张 9.375 插页 1

字 数 248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6826-2

定 价 25.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向我社出版科调换。

序

1999年,里峰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随我攻读博士学位。三年后,他以“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态研究”为题完成博士论文并获得学位。转眼又过了八年,这篇论文终于要出版了。作为他的导师,我很乐意把自己的一点想法写出来,和各位读者分享。

里峰在华中师范大学完成本科和硕士学业,受过良好的历史学专业训练。在论文选题阶段,我建议他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角度探讨中国秘密社会史,但他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决定以中共组织形态为题撰写博士论文。我向来主张培养博士生应该充分发挥学生个人的兴趣和特长,所以很尊重里峰的选择,也相信他能给我一个满意的交代。果然,两年后论文提交答辩的时候,担任答辩委员和评阅人的十多位同行专家一致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一篇立意新颖、资料翔实、结构严谨、论证充分的优秀博士论文,也是中共党史研究领域一部别开生面的力作。经过修改完善,正式付梓的书稿又有明显提升,立论更严谨,分析更深入,行文也更流畅了。

和以往中共党史、中共组织史研究侧重制度条文而忽略实际运作的情形不同,本书另辟蹊径,将关注重点从制度层面转向了实践层面、运作层面。作者以山东抗日根据地为中心,以各级党内文件为基本资料,综

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侧重探讨与党组织相关的各种实践问题,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态活生生地展示出来,令人信服地揭示了共产党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全书凡六章,分别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党员群体、干部群体、组织结构、党员教育、组织纪律、党政关系作了深入探讨。书中关于党员群体和干部群体的社会构成、新党员的吸纳机制、干部类型及其相互关系、基层组织的情况和效能、组织纪律的制定与实施等问题的论述,都颇具新意和深度,予人启迪。

在对 20 世纪中国历史的研究中,海内外学者都很注重对国共两党进行比较分析。总体而言,港台及西方学者往往着眼于组织结构,突出两党的相似性;中国大陆学者则更多地着眼于阶级属性,强调两党的差异性。里峰在利用大量档案资料深入探讨中共组织形态的同时,又借鉴国民党史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从不同方面对国共两党作了深入比较。他从主义话语和建党原则上看到了两党之同,更从社会基础和组织效能上看到了两党之异,从而丰富和深化了读者对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理解。

里峰在求学期间和毕业之后,一直和我保持着密切联系。在我看来,他是一位思想敏锐、视野开阔的青年学者,具有很强的科研能力和很高的学术悟性,正处于学术研究和创造的黄金岁月。博士论文的出版是一个逗号而不是句号,希望里峰继续努力,在学术道路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是为序。

蔡少卿

2010 年 7 月于南秀村

目 录

导言 1

- 一、学术史回顾 2
- 二、思路、方法和资料 16
- 三、山东党组织发展概况 24

第一章 党员群体分析 29

- 一、阶级身份与政治表现 30
- 二、组织规模的发展变化 44
- 三、党员群体的社会构成 52
- 四、新党员的吸纳机制 64

第二章 干部群体分析 78

- 一、干部配置和干部人数 79
- 二、干部群体的社会构成 87
- 三、干部群体的类型分析 97

第三章 组织结构及其效能 125

- 一、干部的任用与流动 126
- 二、组织系统和上下级关系 136

三、基层组织的形态与效能	148
第四章 党内的政治社会化	164
一、党员教育的内容、方式和成效	165
二、干部教育和训练	177
第五章 组织纪律及其执行	190
一、组织纪律的基本原则	191
二、纪律执行的实际情形	200
三、整风审干及纪律执行中的偏差	214
第六章 党政关系及其实践	226
一、日常工作中的领导关系	227
二、“三三制”及其实际运作情形	242
结语	257
主要参考文献	272
附录:抗战时期山东党组织序列	287
后记	290

表目录

表 1.1	1921—1927 年全国党员数目统计表	45
表 1.2	1944 年 2 月山东各地区支部和党员数目统计表	47
表 1.3	胶东、鲁中部分地区党员人数增减统计表	48
表 1.4	1944 年渤海五地委党员与人口比例统计表	51
表 1.5	1944 年部分地区党员分布范围统计表	52
表 1.6	1941 年 1 月山东各地区党员成分统计表	54
表 1.7	鲁南区若干农村支部党员成分变化表	57
表 1.8	1940 年 10 月鲁西区党员性别统计表	61
表 1.9	1942 年 8 月东海地委党员年龄统计表	61
表 1.10	部分地区党员教育程度统计表	63
表 2.1	1942 年 1 月各地区提拔干部人数统计表	81
表 2.2	1942 年 8 月东海地委党务干部配备表	82
表 2.3	1944 年鲁中区四县县级主要干部人数和缺额统计表	83
表 2.4	1943 年 9 月山东省政权机关精简人员统计表	85
表 2.5	1944 年鲁中区各级干部增减统计表	86
表 2.6	部分地区党务干部成分统计表	89
表 2.7	各级干部成分综合统计表	90

- 表 2.8 1944 年底行政干部成分比例统计表(%) 92
- 表 2.9 1944 年 9 月鲁南区党员干部成分统计表 93
- 表 2.10 1944 年 9 月鲁南区党员干部年龄统计表 95
- 表 2.11 部分地区党务干部教育程度统计表 96
- 表 2.12 1943 年底鲁南区党员干部教育程度统计表 96
- 表 2.13 1943 年鲁南区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统计表 110
- 表 2.14 1945 年五龙县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统计表 111
- 表 2.15 1942 年 5 月清河区干部职业化情况统计表 115
- 表 2.16 部分地区党务干部入党时间统计表 117
- 表 2.17 1944 年各级党务干部入党时间综合统计表 118
- 表 3.1 胶东区北海、西海地委提拔干部情形统计表 129
- 表 3.2 胶东区北海、西海地委干部提拔流向统计表 129
- 表 3.3 抗战期间泰安、牟平、掖县县委书记更迭情况表 135
- 表 3.4 1940 年 10 月鲁西区各级领导机关及党员人数统计表 138
- 表 3.5 部分地区基层党组织的数目及规模统计表 151
- 表 3.6 1944 年渤海区五地委支部和党员工作效能统计表 161
- 表 4.1 抗战时期山东省级党校训练干部情况表 183
- 表 5.1 山东各地区处分党员综合统计表 201
- 表 5.2 1942 年 6—12 月东海地委执行党纪统计表 204
- 表 5.3 1944 年 1—6 月北海地委处分党员统计表 205
- 表 5.4 部分党员清洗原因统计 207
- 表 5.5 部分地区党员审查结果分类统计表 210
- 表 6.1 1942 年 8 月东海各县抗日民主政权人员构成比例统计表(%) 246
- 表 6.2 1944 年 12 月各地区村政状况统计表 250
- 表 6.3 1942 年 12 月若干地区村政干部成分比例统计表(%) 250
- 表 6.4 1941 年冀鲁豫区各级政权人员构成统计表 251
- 表 6.5 1944 年 9 月鲁南区各级政权中党员人数统计表 252
- 表 7.1 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现代西方政党组织形态之比较 266

导 言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是关于中国共产党之历史地位的经典论断。所谓“开天辟地”,首先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和唯一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①。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这无疑是前所未有的第一次。但若从政党组织形态的角度来看,这一判断仍然可以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出现了第一个具有严密组织系统和强大动员能力的现代型政党,这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由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对中国乃至世界历史进程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中外学界在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领域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相比之下,与中国共产党组织本身直接相关的研究还显得比较薄弱。大体而言,关于中共组织演变的概述性、通论性著作较多,而对党组织进行时段性、地域性考察者较少;对组织制度之规定和组织机构之沿革论述较多,而对组织和制度的实际运作情形关注不够;对上层、中层组织的结构和演变论述较多,而对基层组织的情况和效能有所忽略。有鉴于此,本书试图以山东省为考察区域,以山东省档案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馆所藏的革命历史档案和已出版的《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为主体资料,以组织和制度的运作实态为关注重点,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态进行深入探讨,进而揭示共产党与乡村社会间的互动关系,以期将中共组织史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

一、学术史回顾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因而很早就开始了对自身历史的研究。1925年10月,中共早期领导人蔡和森应邀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共旅莫支部作中共党史报告,后经整理油印成册,题为《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该报告阐明了中共党史研究的目的、任务和对象,强调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共党史研究,分析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党的历史使命,勾勒了中共早期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这篇数万字的报告提纲初步建立了早期中共党史的研究体系,可以看作中共党内最早的党史研究专著。^①此后又有多位中共领导人和党内理论家,以报告、讲义或著作的形式对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作了简要梳理与阐述。其中关于中共党史者主要有李立三于1930年1月至2月所作的《党史报告》^②,瞿秋白于1929年12月至1930年6月在莫斯科列宁学院和中国劳动大学讲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③;关于中国革命史者主要有恽代英于1926年在劳动学院讲授的《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④,华岗于1931年出版的《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⑤,张闻天于1933年在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学校(中央党校)讲授的《中国革

① 参见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及其使命》,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82年版,第1—76页。

② 李立三:《党史报告》,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82年版,第204—277页。

③ 瞿秋白:《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82年版,第151—203页。

④ 恽代英:《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载《恽代英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23—974页。

⑤ 华岗:《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

命基本问题》(后更名为《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①等。

1949年10月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新中国的执政党,中共党史研究得到很大发展,出版了一批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著作。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胡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以及何干之的《中国现代革命史》。《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是胡乔木为中共中央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而写的长篇文章,于1951年6月在《人民日报》发表,随即出版单行本。该书基本按照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来论述党史,大量引用毛泽东、斯大林等经典作家的论述,着力宣传毛泽东的功绩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为此后较长时期的中共党史研究确立了引经据典、以论代史的基调。②胡华于1949年秋编写、1950年3月出版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部中国革命史教材。该书同样以宣传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革命功绩、历史地位为主旨,注重引用经典作家论述,强调从政治因素出发论史,但在史论结合方面较胡乔木的著作为佳。③何干之受高教部委托编写了《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1957、1958年经修改增补后改名为《中国现代革命史》,分上、下两册出版。该书的特点是“以乔木同志的书为经,以伯达同志的书为纬”,同时参照毛泽东的著作和党报各个时期的社论,基本上是史从论出,但在内容上不仅限于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对经济问题、民族问题等也有所论述。④这三部著作出版后不断重印,累计印数均达到数百万册,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影响最大的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著作。

随着1957年反右运动的扩大化和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开展,政治生活中“左”的倾向不断发展,中共党史研究也受到了很大干扰。这主要体现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逐渐形成,突出毛泽东成为

① 张闻天:《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82年版,第323—451页;《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② 参见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

③ 参见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人民出版社1950年版。

④ 参见何干之《中国现代革命史》(上、下),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1958年版。

写作党史的基本规范；路线斗争逐渐成为党史的主线，多线条、多侧面、多层次的研究被单线条的表述所取代；批判式的研究取向越来越严重，否定一切和肯定一切式的极端化论述蔓延开来。“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些不良倾向进一步发展，中共党史几乎变成了毛泽东个人历史和路线斗争史，党史资料建设也陷入停顿状态。^①

1978年以后，这种情形发生了实质性改观，随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和改革开放事业的推进，中共党史研究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中共党史学会、毛泽东思想研究会、党史人物研究会、新四军研究会等各类学术团体广泛成立，相关领域的各种学术会议频繁召开，《中共党史研究》、《党的文献》、《党史研究与教学》等一系列学术刊物相继创办，对国外和台湾地区中共党史研究的译介工作发展迅速，党史资料建设突飞猛进。与此同时，学术研究中的自由氛围日盛，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领域的研究者们也不再满足于用简单化的政治话语来描述和解释历史，开始自觉打破对党的领袖和党的历史的教条式、神话式叙事，试图站在较为客观的立场上探讨相关问题。个人崇拜、全盘肯定或否定、贴标签、以论代史、教条主义的研究风气和领袖史、路线斗争史、歌功颂德史的写作模式开始被抛弃，实事求是、史论结合、客观评价逐渐成为学者们的共识。^②

这一时期的通论性中共党史著作，可以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和沙健孙主编的《中国共产党通史》为代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是在杨尚昆、胡乔木、薄一波等中央领导人的提议下，由胡绳主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一部中共党史著作。该书主旨，一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道路和经验教训进行全面总结，二是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未脱历史研究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框架。但其内容比较丰富，立论比较公允，“夹叙夹议，有质有文，陈言大去，新意

① 参见周一平《中共党史学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8—122页。

② 参见周一平《中共党史学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0—221页。

迭见”，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①《中国共产党通史》是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家机构的20多名学者分工合作撰写而成的，全书分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在大革命的洪流中》、《掀起土地改革的风暴》、《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为新中国而奋斗》五卷，共计300余万字。该书旨在“向读者提供一部内容比较翔实的党史著作”，并借此对读者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从全书内容和论述来看，应该说基本实现了这两个目标。^②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开始跳出官修史书的框架，真正从历史学而不是现实政治的角度出发研究中共党史，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出版了一批方法新颖、视野开阔、观点多元的著作。例如，萧延中在西方毛泽东研究和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脉络中，对早年毛泽东的思想禀性和个人气质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探讨了“毛泽东现象”与中国历史传统、社会结构、经济基础、制度设施、民族心理、理论体系、时代特征之间的关联。^③戴向青、罗惠兰对上世纪30年代发端于赣西南，随后蔓延于全国各苏区的肃AB团运动进行了详细考证，为这一冤案的澄清和平反发挥了积极推动作用。^④何友良从政治权力结构、社会阶级结构、两性关系结构和苏区农民社会生活等方面，较系统地论述了共产主义革命对苏区乡村社会变迁所产生的影响。^⑤杨奎松根据大量中苏档案和亲历者的回忆，按历史发展的顺序，对涉及毛泽东与莫斯科关系的历次重大事件以及毛泽东的性格和处事特点作了细致描述与深入剖析。^⑥高华在大量搜寻、考辨相关历史资料的基础上，从实证研究的角度，详细论述了延安整风运动

① 参见胡绳主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引文见胡乔木为该书撰写的卷首题记。

② 参见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通史》（第一至五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2000年版。引文见该书第一卷卷首。

③ 参见萧延中《巨人的诞生：“毛泽东现象”的意识起源及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的发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

④ 参见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⑤ 参见何友良《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

⑥ 参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的前因后果及其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勾勒了毛泽东成为党的领袖、毛泽东思想成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基本脉络。^① 这些论著的研究思路未必确当,具体结论或有可商,但都力求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还原历史场景,或在研究方法和视角上有所创新,提升了大陆学界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水准。

西方学界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探讨,往往是为了解释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起源与胜利。在中国政治从传统王朝体制向近代政党体制转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1921年成立的共产党与1924年改组后的国民党,都是在列宁主义建党原则之下组织起来的现代型政党。从政党组织形式来看,两者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以至有学者称它们是“一根藤上结的两个瓜”。^② 然而在短短20多年间,两党的实力发生了不可思议的逆转,历史长久、资格老到、实力强大、外援充足的国民党最终失去了在大陆的统治地位;共产党则在极度复杂的政局中脱颖而出,不断发展壮大,先后赢得了对外来侵略者和本国竞争者的胜利,在中国大陆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权。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何以发生,又何以能够取得胜利,成为西方汉学家们研究中共党史时争论不休的一个终极性问题。

1936年6月至10月,美国记者斯诺(Edgar Snow)穿越国民党的重重封锁进入陕北苏区,对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进行采访,并与红军指挥员、普通战士和解放区的群众交谈,在此基础上撰写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于1937年由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生动而朴实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革命业绩,成为西方知识界观察和研究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著作。该书虽然是一部纪实性作品,但作者已开始有意识地思考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何以发生的问题。在斯诺看来,只有当共产党满足了

① 参见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② 参见章开沅“序”,载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

保守狭隘的农民阶级的直接经济要求时,他们才可能被整合到民族解放运动中来;共产主义运动是长期经济衰败所导致的革命进程的一部分,民族战争的爆发加剧了这一进程,因此战争是革命的催化剂而不是它的前提条件。^①

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余年间,西方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研究深受冷战大背景的影响,“同谋论”成为主流的解释模式。该模式认为,中国革命的发生和最终结果主要是由国际因素而非国内因素所决定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生是苏联支持中国共产党的结果,而国民党的战斗力则因为美国援助不力和对苏联的外交让步而被削弱了。与之密切相关的是“组织武器”论,意指列宁主义式的高度纪律化和职业化的组织通过冷酷操纵来攫取权力,因此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是革命政党和政治精英“策划”出来的。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观点有所不同,他认为,中国共产主义的胜利是因为共产党抓住了两个重要因素,即“作为小农阶级动力的土地革命及作为知识分子动力的民族复兴”。不过,在整个 50 年代的西方中国研究中,费正清的看法只是一个例外,绝大多数学者更加强调国际事务的影响。^②

60 年代以后,西方学界出版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重要著作,并围绕中国革命得以发生与取得成功的根源展开了长期争论。约翰逊强调抗日战争与共产主义革命的密切关联,认为日本人的侵略和奴役激发了农民的民族主义情绪,共产党利用这种情绪赢得了广泛的民众支持,因此,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动力来自民族战争和共产党的抗日立场,而不是农民在经济上的不满或党的社会经济改革。^③ 塞尔登提出了

① 参见[美]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9 年版。该书中译本最早在国统区出版,为躲避当局检查而将书名改为《西行漫记》。

② 参见[美]哈特福德(Kathleen Hartford)、戈德斯坦(Steven Goldstein)《关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研究》,孙青译,载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近代中国的乡村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29—333 页。

③ 参见 Chalmers Johnson,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37-1945*,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中国革命中的“延安道路”这一经典命题,其基本内核可以归结为中共如何采用灵活的社会经济纲领和再分配政策,对以农民为主体的各社会阶层进行广泛的群众政治动员。在他看来,共产党的社会经济变革和群众路线的实施,以及农民所表现出的平等主义和参与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取得卓越成就的根本原因。^① 片冈铁哉与约翰逊的看法正好相反,他认为农民与中国共产党之间不存在天然的共同利益,共产党首先利用土地革命等社会经济手段去争取农民最初的参与,然后通过强大的组织化力量与传统精英及其他团体竞争在乡村的领导权。^② 斯考切波则从比较历史社会学的视野出发,对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作了深入的比较研究,她着重从结构性视角(农民为什么能革命)而不是意愿论视角(农民为什么要革命)出发,考察了传统农业社会中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关系、旧制度下国家政权与支配阶级之间的关系、国家在竞争性的国际体系中的地位等结构性关系。^③ 斯科特和波普金对东南亚农民反抗行为的研究,也对中國革命研究领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斯科特认为,在传统乡村社会存在一种“生存伦理”,这种伦理主张所有人都有权依靠村庄资源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农民反抗行为并不是客观存在的经济剥削的必然结果,而是对传统权利义务原则被破坏的一种回应。^④ 波普金则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出发,将农民视为理性的个体,认为农民政治与其他类型的政治在本质上并无差别,农民参与革命运动是在各种可能性中进行

① 参见 Mark Selden, *The Yenan Wa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中译本为《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魏晓明、冯崇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

② 参见 Tetsuya Kataoka, *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Communists and the Second United Front*,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③ 参见 Theda Skocpol,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中译本为《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何俊志、王学东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④ 参见 James C. Scott,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中译本为《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程立显、刘建译,译林出版社 2001 年版。